

鑪峰遠眺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學者，我經常反思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近十年來，一直關注和思考兩個問題：一是香港經濟的周期性變動與結構性調整的關係，二是香港政治對經濟的影響。期間，判斷有對，也有偏差。

例如，2000年，香港經濟在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而陷入長達5個季度的負增長後，呈現強勁復蘇。是年底，我形成一個判斷：香港經濟的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調整明顯背馳，並預言在2001年將持續。後來，事實證明，稱二者「背馳」沒有錯，但是，低估了經濟結構性調整停滯不前給經濟周期性變動帶來的負面影響——2001年中，香港經濟再度逆轉為負增長。

又如，2005年12月，特區政府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遭立法會否決。我擔憂香港政治矛盾惡化將會給2006年香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但結果是，2006年、2007年，香港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失業率不斷下降，特區政府財政狀況顯著好轉。

政治阻香港經濟轉型

一時看對，不等於就把握住了香港經濟與香港政治、經濟周期性變動與結構性調整的關係。一時看錯，也不等於就偏離了把握上述諸關係的方向和目標。

譬如，2005年政改方案夭折之所以沒有對兩年後香港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主要是因為特區政府承繼九七前傳統堅持「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以致香港經濟形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形勢相分離；同時，香港經濟本身的結構性調整固然大體故步自封，但是，特區政府在2002年下半年調整土地房屋政策，使地產市場恢復香港經濟支柱的角色。從經濟層面看，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確是周期性增長與結構性調整停滯之間呈現明顯背馳。從政治與經濟關係角度看，前者固然沒有影響後者的周期性表現，卻給後者的結構性調整形成深刻的障礙。

這些年來，我反覆講一個觀點：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之所以沒有能夠取得重大突破，

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政治。關於香港政治發展無休止的爭論耗盡了香港寶貴的精神力。特區政府因為種種因素而疏於對香港長遠發展的謀劃和推動，則是另一個屬於政治層面的大問題。結論是：香港政治不發生顯著轉變，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就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

政治轉變無可迴避

總結香港經濟政治歷史，總結香港政治經濟研究心得，不能不高度重視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政治經濟已經和將會面對的困難。

就香港經濟周期性變動與結構性調整的關係而言，前者正在走出「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嚴重衰退，但是，復蘇頹弱；後者依然是語言巨人，行動侏儒。姑且不論所謂六大優勢產業中究竟幾個真正具有優勢，令人遺憾的是，2010/11財政年度預算案缺乏紮實推動所謂優勢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就香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而言，在是否允許有人以「補選」為名行「公投」之實問題上，兩大對立政治派別即將攤牌。這是香港九七前留下來的政治矛盾演變的必然，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治攤牌。其本身是一次重大政治戰役，然而，不是重大戰略政治決戰的結束，相反，是標誌重大戰略政治決戰的開始。

國家執政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自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領導下開始，30多年來，一直為維護香港穩定繁榮而盡心盡力。容讓、關愛、支持、克己，一再展示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誠意和決心。然而，「樹欲靜，風不止」。有政治勢力及其代理人得寸進尺，得隴望蜀，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底線」，香港政治轉變到了無可迴避的地步。

「投鼠」固然「忌器」。但是，「養虎」必定「遺患」。這是《基本法》和中央憲制權威與暫時市場經濟可能波動之取消，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探索與時俱進必定會遇到的長痛與短痛之抉擇。

香港政治不發生重大轉變，香港發展政制民主就會繼續寸步難行，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也將繼續躊躇不前，香港經濟周期性表現也將會起伏不定。

港政經困難不可低估

周八駿

鼓勵更多內地生來港升學

全國政協委員 楊孝華

的院校，甚或遭到學區欺騙而蒙受損失。

其實，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中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國際化大城市，各類教育課程均有極高的水準，又可為學生提供英語練習語境，加上地理位置優越，既能提供國際化教育，又可方便學生聯繫家庭，故每年香港的大學在內地招生時，申請者均超出名額數以倍計，香港實可以配合國家發展，為培育人才出力。



能否安排內地生來港升學的中學唸書呢？

參政議政

隨着中國經濟及民生水平急速發展，國民質素日見提升，而接受多元化教育，擴闊視野，有助國家進一步培育人才，提升競爭力。不過，近年內地留學生雖然數以萬計，但他們多選擇到海外，如美國、英國、澳洲，甚或到東南亞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除大學生外，較少到一水之隔的香港，情況值得關注。

美國是中國留學生的一個熱門升學地點，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公布的資料，在2009年，一共有98500名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赴美留學，佔所有留美國學生總人數的14.6%，比2008年的約8萬人，增長達兩成一，預測今年中國內地赴美留學生總數更將突破10萬人。據美國教育界人士指，赴美學生有年輕化趨勢，目的是希望子女可盡早適應，及學好外語。

不過，目前內地高等院校以下學生，來港升學基本上相當困難，這與他們較易到美、英、澳等國留學有分別，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好應該在此問題上一視同仁。

事實上，出國留學費用不菲，如到美國升學，若由高中讀至大學畢業，花費最少40萬美元。故越多內地生到外國升學，外匯流出越嚴重，而且現時出國留學的學生，除大學生外，中小學生為數亦不少，故在大量內地生湧往外地留學的情況下，亦難免報讀了水平不高

港事講場

廉署維護香港法治美譽

仁人

士。廉署的行動有如下的特點值得稱道：

其一，不管你是什麼「名人」，官階高低，只要觸犯法例，一經揭發，立即調查追究，繩之於法，絕不留情。

其二，不管你是何方黨派，一經查出，都予定罪，以程介南（民建聯副主席）案、李繼雄（民主黨中央委員）為例，表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三，香港回歸以來，廉署發動群眾檢舉揭發貪污案更多更細，再不會受到其他部門（如警員、上司）壓力，有力維護了《基本法》第5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的憲制地位。

倫敦金融城政府最近公布75個金融中心排名，倫敦、紐約並列第一，香港緊隨其後排名第三，並從去年與紐約、倫差距由61分縮窄至36分，香港仍是法治最健全最可靠的投資之地，這種美譽，與廉署的執法無私分不開！

「威遠」行動似醒世恆言

其次，由「威遠」行動表明：廉，對每個

人來說，是何等重要。所謂廉，就是不貪，不苟取。《孟子·離婁下》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們貪念在可取和不可取之間千萬勿取，因它傷了廉潔的美譽。故王逸注《楚辭》廉潔二字曰：「不受曰廉，不汙曰潔。」我們宜記住老祖宗的告誡。

其三，權力使人卑鄙，真理使人崇高。一個人有了權力，若不潔身自好，奉公守法，就會以權謀私，像審批、安排表演秀，可以用權剝削別人人工，漁人美色。故尼采說：「自由的生活仍等待着偉大的靈魂去享受。」靈魂航船渺小，再多的權和錢，也不能自由享受，因鐵窗生涯如影隨形。

其四，貪字害人。《伊索寓言》中的狗和影子就是教訓：狗見自己水中的影子啣着肉，便丟下肉跳進水中去搶，淹死了。有肉就好了，再貪，命也沒了。

「威遠」行動看似拍案驚奇，實是又一次喻世明言和醒世恆言。而廉署的「包青天」形象從此更深得民心，香港法治之都的美譽也更亮麗！

名家指點

匯策絕不向美屈服

易憲容



易憲容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逾百名美國國會議員前日呼籲奧巴馬政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些議員的理由是，由於人民幣的低估，導致了中美貿易不平衡，全球經濟失衡；由於人民幣匯率的低估，使得中國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匯儲備積累快速增長，從而使中國匯率失調，並威脅到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人民幣匯率問題經常成為歐美政客籌碼，這並非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選舉問題。因為，如果把人民幣的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既可找到指摘中國的理由，也可能使國民由國內經濟的困境轉移視線。

美政客顛倒因果

2008年下半年美國金融海嘯爆發之後，儘管美聯儲採取了廣泛與強勁的救市政策，但是當美國金融體系崩潰之後，不僅整個經濟出現了全面衰退，社會財富全面地縮水，而且整個經濟生活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跌落歷史低點。為了減輕民眾對政府的政治壓力，美國一些政客往往會找一些推卸責任的理由，最為明顯就是以學術研究的角度，主張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而全球經濟的失衡又在於人民幣匯率低估及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過大，從而使得亞洲國家大量的便宜資金進入歐美市場。他們說，這不僅讓歐美國家過度消費，也是金融市場高槓桿率的根源，是美國金融市場資產泡沫的根源。

但是，實際上這是顛倒因果關係。因為，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沒有這種國際貿易上的大分工，也就不會有前一輪世界經濟的繁榮，更沒有美國經濟幾十年的繁榮。在大繁榮中，美國是最大贏家，全世界最好的資源低成本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讓美國人民分享到經濟全球化的最大成果。

制裁中國出口弄巧成拙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也並不是20年來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果。在歷史上，金融危機從沒間斷過，早些時候沒有全球貿易失衡，同樣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美國政府對

投資者提供「免費保險」。比如，最近幾年來，美國一系列金融危機都是美聯儲製造出來的。美聯儲為了短期的經濟繁榮，一直在採取無限信用擴張的方式濫發貨幣。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一直以隱性鼓勵的方式使投資者進入高風險投資。投資者相信，不管事前政府說什麼，一旦金融危機發生了，政府必然會為這種高風險或錯誤判斷擔保，高風險投資的企業或個人不必承擔錯誤決策的風險，豈能不有恃無恐？看看近幾年來華爾街金融高管的所作所為，就知道美國金融危機完全是美國政府縱容的結果，豈可轉移到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上來呢？

退一萬步說，就算人民幣匯率真的對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有很大影響，那麼讓人民幣快速升值，是不是可以減輕美國人民的就業壓力呢？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出口給美國的產品是美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及許多廉價資源的產品。就算中國減少這些產品對美國出口，美國企業也不可能生產這類產品，因為美國的要素價格過高。這樣，產品的生產只能移到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而不是美國。這將增加生產成本及美國人的負擔，對美國的就業沒有多少幫助。如果美國國會想通過人民幣匯率制裁中國出口，必定弄巧成拙。

人民幣不能隨便升值

本來，儘管匯率制度選擇有一定的政治抉擇的意義，但人民幣匯率從根本上仍然是一個經濟問題。在市場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以供求關係為基礎。當然，通過匯率制度可保護國家利益。美國國會議員經常對中國人民幣匯率指手劃腳，不正是希望透過政治途徑來爭取美國人的利益嗎？那麼憑什麼中國政府就不可通過匯率制度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呢？至於美國議員指責人民幣為什麼要與美元掛鈎，那更是可笑。如果現在不是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人民幣要與美元掛鈎嗎？既然美元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有收益，也得承擔義務與責任。

總之，人民幣匯率應是一個經濟問題，不要政治化。如果要把人民幣匯率政治化，就不是一方壓制另一方的問題，而應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看雙方的政治交易如何。我相信中國政府能夠在合理的基礎上保護國家利益，而不會被美國政客所屈服。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人民幣不需要升值，也不能升值！

北望神州

用工荒是局部結構性問題

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魏達志

從城市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導致了數以億計的人口逐步進入全國各類城市，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城市化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農村人口每年以1.5%至2%的速度向城市轉移，隨着人口政策和戶籍政策的變化，農村人口更加便於在各類中小城市入戶和工作，使得農村人口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偏好和選擇權。

從人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新生代的農村人口素質有了一定的提高，他們對未來的發展有了更多的期盼，不僅希望能夠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同時也有了一定的經濟追求和價值追求。雖然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經濟發達、用工數量多，但是用工待遇和用工環境並沒有多少優越性。因此農村人口素質的提升，對選擇其能夠工作的城市以及該城市收入和消費的性質比有了新的判斷。

制度性因素待解決

出現「用工荒」的理由似乎已經成立，但是，「用工荒」畢竟已經出現，畢竟在供給和需求上產生了矛盾，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若干地區和產業的正常發展，我們是否應該深入發掘一下在影響「用工」方面存在的若干制度性因素呢？

首先，我們要追問當前的用工制度，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各個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給勞務工帶來更多的福利和待遇，無論是珠江三角洲，還是長江三角洲，至少最近15年來勞務工的工資和待遇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沒有發生隨着經濟增長而增長的福利效應，使得廣大勞務工仍然處在非同等經濟水平的環境下工作和生存。

其次，我們要追問現行的分配制度，當全國普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的同

時，對於建立和諧社會和關注民生的目標是有相當差距的，這個市場制度和分配制度是有缺陷的。在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上，只有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才是科學發展的經濟制度。

再次，我們要追問當前的福利制度，當着中國經濟大幅度增長、稅收大幅度增長、政府財政大幅度增長、不少發達地區和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生福利和社會和諧，不僅廣大勞務工不能普遍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福利和成就，而且不少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方面呈現不平衡的發展態勢。

最後，我們還要追問當前的教育制度，我們的教育制度能否培育緊跟中國產業發展、經濟發展的緊缺人才，是評價這個制度相當重要的標準。目前不僅是勞務工就業有問題，大學生就業仍然有壓力，如果不能夠大批量地培育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緊缺人才，那說明我們的教育制度、教育導向存在問題。

因此，不能忘記我國的人均GDP還排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之後，不能忘記我國還有許多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等待就業，不能忘記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追趕世界發達國家重任道遠！

中國作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人口大國，在用工方面整體而言是供大於求，因此目前的「用工荒」是局部的、結構性的。

我們需要新一輪的改革創新，需要新一輪的制度建設；我們既要防止市場缺陷，又要避免政府失靈；我們既要同心協力，又要艱苦奮鬥；由此支撐和帶動我們新一輪的經濟發展。同時通過調整用工的人口要素、經濟要素包括供求關係等，解決本來就不應出現的「用工荒」問題。